



汉碑篆额书风对清代篆刻的影响研究*

黄逸伦

huangyl@zjvtit.edu.cn

(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浙江杭州 311112)

摘要: 两汉碑额篆书在中国篆书发展史上占有举足轻重的地位,与同时代的其他书体具有同一历史性,因其存在自身独立的艺术语言,具有独特的个性特征。本文通过对两汉碑额篆书风格的整理、解析和分类,分析篆额书风及精神气息的传递,深入考查了汉代碑额篆书对清代书家的篆刻创作风格的影响,肯定其为清代中后期碑学兴盛奠定了基础。本文的研究成果可为清代篆刻艺术的研究提供参考价值。

关键词: 汉碑篆额, 书风, 清代篆刻, 影响

1 前言

秦亡汉兴之际,书法艺术的发展并未中断。到西汉初期,文字还是承袭了“秦书八体”,小篆依旧是较为通行的书体。当时,政府以善书“秦书八体”作为选拔官吏的依据,这一政策从某种程度上也保持了秦代书法的延续性。到了汉武帝时期,儒学成为学术之宗,社会尚文的风气使得树碑铭文蔚然成风。另一方面,秦汉时人葆有死后重生的观念^[1],遂崇尚厚葬,依考古材料来看,一大批碑刻文献也出土于墓葬。虽然秦汉时,隶书字形发展已经成熟,并作为法定书写形式而被广泛地应用于官方文书中,篆书失去官方文字的地位。但因篆书古雅格调、特

***基金项目:** 本文系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 2022 年度科技基金项目(学工专项)“美育融入高职大学生思想政治教育有效性研究”(编号: 2022YXS10)、2022 年度校级教改项目“课程思政理念下书法类课程育人的教学改革研究”(编号: 822218JW02105)的阶段性成果。

作者信息: 黄逸伦(1992-),女,汉族,浙江金华人,浙江交通职业技术学院讲师,研究方向:篆书书风研究、隶书书风研究、碑额书法风格研究等。

通讯信息: 黄逸伦,电话 18768184318,邮箱 huangyl@zjvtit.edu.cn,浙江省杭州市余杭区莫干山路 1515 号,邮编 311112。

2789-5165/© Shuangqing Academic Publishing House Limited All rights reserved.

Article history: Received February 24, 2023 Accepted April 11, 2023 Available online April 12, 2023

To cite this document: 黄逸伦(2023). 汉碑篆额书风对清代篆刻的影响研究. 艺术与文化研究, 第3卷, 第1期, 24-27页.

Doi: <https://doi.org/10.55375/jacr.2023.3.4>

别的审美追求，而具有特定的接受群体、文化高点，更多为上层知识分子沿用、书习^[2]。故而，在重要的官方文书及隆重的仪典、还有碑额、宫殿的砖和瓦当等需书写之处都有篆书的身影，且书写之人地位尊显，能因字数对部分碑额形制、面积做相应处理，手法多样，风采独具。因此，可以说汉代碑额篆书是汉篆中独树一帜的一种样式，遥领了汉代篆书的独特风貌。

在为数不多的现存两汉时期的碑额中，篆书碑额的数量占绝对优势，尤以题名碑额篆书为常见^[3]。这一时期的碑额篆书是秦代小篆的延伸和转化，一方面，继承了秦篆风格，另一方面与秦小篆的工艺性、标准规范的特征又有着很大的区别。两汉时期的碑额篆书打破了秦小篆笔画均匀、结体修长等创作格局，结体上更为丰富多样，灵活生动，用笔形态自由奔放，变化夸张，无拘无束^[4]。此外，汉代碑额篆书在书写过程中，随意依文字的个体结构的长短方圆而发挥，因此形态万殊^[5]。但同为篆书，必有其共性，不论是秦小篆还是汉代碑额篆书，都具有生动、厚重、淳朴、雄强的特点。在碑额上篆书的应用起到美观，给人以庄重的效果。汉碑篆额体现出来的丰富风格和独异面貌，是对秦代代表性小篆的极大突破和创造，有极高的审美价值和极强的艺术性。虽然从存世的史料看来，汉碑篆额极为稀少，但仍无法撼动其在书法史上的重要地位。

2 汉碑篆额书风的审美特征

两汉篆书碑额存世稀少，依保存至今的碑额实物来看，其风格多为古朴、用线厚重、节奏变化快速明晰、生动灵活，大量使用变形与夸张等带有装饰性的艺术处理手法。我们通过对现有两汉时期篆额的考察发现，该时期书风具有自身独立的审美特征与品格气质，大抵可概括为以下三点：

①体势宽博灵动。两汉的篆书较秦篆更为淳朴雄浑，两者相比，汉篆用线的浓厚庄重是秦篆难以望其项背的。而且，汉篆的结构宽博，体态松动，较秦篆的严谨整齐，汉篆更显生动。

②造型夸张巧变。秦代小篆的笔画粗细均匀，字形基本呈长方形，重心偏上。而两汉篆碑，由于书写区域的特殊性——碑额狭小，很多字体的结字需要随书写区域来布局。所以，在单字处理上，碑额上的篆书长短、大小、方圆往往不定，从而形成夸张变形的体势。碑额上的篆书有时还会借鉴自然物象的“垂露篆”、“悬针篆”等风格，抑或是印章中摹印风格，真可谓巧变迭出，千姿百态。

③笔法篆隶互用。书法在各种书体定型之前，书体演变都是以一种新的书写形态诞生为标志的，在每一种新形态逐渐形成的过程中都有一个中间过渡形态。两汉时期的篆额，就是篆书向隶书转变的中间形态。笔法上除了常用的平移推动的轨迹外，也增加了提按上下运动的轨迹，出现波磔的意味。这种中间形态必然会兼具两种书体的某些共同特征。两汉时期已通行隶书，当时的人对篆字已经比较陌生，所以篆额中也常见隶书的字形特点。

3 对清代篆刻的影响

在清代中后期，书家们开始注意碑额的艺术价值，尤其是两汉时期的碑额。乾嘉时期，书学思想和书法风气的转变影响了书法的创作，文字学、金石学等专门学科获得了突破性的发展，^[6]这些皆促使了碑学书风的确立。通过清代书家与篆刻家对两汉篆额中书风、结体、技法等方面的借鉴与取其精华，使两汉篆额及篆书的研究得到复兴，引起时人、世人对其极大的重视与关注。

自小篆发明之日起，都逃不开“二李”（李斯和李阳冰）的影子。在清代初期，作篆者以王澐、孙星衍、钱坫为代表的书家，依旧是按部就班，追求工艺美，使篆学陷入了绝境。直至邓

石如的出现，才打破了这一习篆的僵局。邓石如的小篆，以“二李”为基础，兼参以汉碑额篆书的体势，例如《祀三公山碑》、《天发神讖》、《开母石阙》、碑额瓦当等金石资料，字形在方圆之间游走变化。邓石如也吸收了汉碑篆额质朴敦厚的风格并加以发挥，使其篆书布字浑圆，气势磅礴。由此看出，汉碑篆额对邓石如篆书风格的形成产生了较大的影响。众所周知，汉印文字多为缪篆，汉碑篆额在字法变化上与缪篆颇为相通。邓石如的篆刻恰以汉印为开端，深受其中的精神启发，发现了汉碑篆额与汉印的共性美^[7]。

邓石如一生治印不计其数。在他的传世佳作中，最具篆书功底，且最富汉碑篆额意趣的应属其小篆朱文印了。其中，“意与古会”（图1）是最负盛名的，从此方印中能看到《韩仁铭》碑额（图2）的影子。此印为了适应方形印面，将原本为纵势的小篆压扁，取其横势，圆转流畅的富于装饰性的汉碑篆额篆势尽显端庄典雅。“意”、“与”二字线条盘曲，方圆兼济，气势恢宏。它标志着邓石如在“印从书出”上取得初步的成功。“江流有声断岸千尺”这方印（图3）体现了邓氏在创作实践“疏处可使走马，密处不使透风”的创作理念。其文字与笔意融为一体，笔间线条相互穿插，与《张迁碑额》（图4）有异曲同工之妙。“流”、“有”、“声”、“断”四字笔法曲折回环，恰与“江”、“岸”、“千”、“尺”等字之疏朗两相对比，境象顿生。



图1 意与古会



图2 韩仁铭碑额



图3 江流有声断岸千尺



图4 张迁碑额

到了晚清，篆刻日益繁盛，一批篆刻大家诸如吴让之、徐三庚、赵之谦、吴昌硕、黄士陵等，均深受邓石如“印从书出”观念的影响^[8]，亦加入汉碑篆额元素，大胆创作，促进晚清后期掀起了一股“印外求印”的风潮热。吴让之为邓石如的再传弟子，印风在其师基础上继承与发展，极其推崇邓石如汉碑篆额入印的理念。

吴让之的“断肠人远惕心事多”（图5）颇具汉碑篆额篆书意味，其意趣颇类《张迁碑额》篆书。此白文印八个字排成两列，受方形印面限制，篆法安排横向扁平。吴氏承袭邓石如取法汉碑额的特点，将“意与古会”的理念应用于白文印的创作，此乃继承吸收并创新的结果。

徐三庚是晚清篆刻史上继邓、吴之后，“印从书出”的第三人，其篆刻风格被誉为“吴带当风”^[9]。其在印章边款中，明确注明了自己是取法汉碑篆额的。朱文印“禹寸陶分”（图6）印款曰：“上虞徐三庚仿汉碑额，为梓楣老仁兄作于森宝楼。时辛未秋九月戊子朔”。此印颇得《韩仁铭》碑额等汉碑额之宽博宏大，印文中结字扁平，篆法方圆兼济，每字均用长笔画回转盘旋。

赵之谦在同时期也具不容小觑的地位。虽然，他一生为他人治印不多，却保存一枚自用并明确模仿汉碑额的印章，朱文印“赵”，印款曰：“悲庵拟汉碑额”（图7）。此印虽说拟汉碑额，但细看结字端庄含蓄，线条圆转流美，更近宋元时期朱文印的意味。

吴昌硕从邓石如的“印从书出”观念出发，一生精研《石鼓文》，并将其融入到篆刻中。他对于篆刻有其独到的审美与见解，尤其钟情于汉碑篆额。生平所治印章中，至少有十余方印章的边款记载其取法汉碑篆额。从这些印作中，能感受吴昌硕所追求的“浑古朴茂”之气。朱文印“俊卿”印款曰：“汉碑篆额古茂之气如此，昌硕”（图8）。当然，吴印也有独创之处。单字朱文印“穀”，其印款曰：“拟张迁碑篆额，缶”，篆法上虽与《张迁碑额》中之“穀”字几乎雷同，但吴昌硕将此“穀”字作了类似封泥印的处理，加强了其虚实之间的对比，堪为经典。



图5 断肠人远 易心事多



图6 禹寸陶分



图7 赵



图8 俊卿

4 总结

汉碑篆额风格灵活，形体多变，因此为篆刻家青睐，然而作为习篆、入印的素材广泛地流行，却是要到清代中叶以后碑学兴盛才出现的现象。从邓石如提出的“印从书出”理念到晚清“印外求印”的蔚为大观，使汉碑篆额的精神气息得以传递，使清代中后期篆刻繁荣灿烂。

参考文献：

- [1] 黄逸伦(2022). 汉碑篆额分类及书风变迁研究. 艺术与文化研究(2), 25-31.
- [2] 胡鹏(2022). 安国藏五十三字本《泰山刻石》考——兼论秦篆的艺术性. 中国书法(10), 66-72.
- [3] 糜杨凡(2014). 两汉篆额的书法艺术. 书法赏评(03), 60-62.
- [4] 刘清扬(2004). 两汉碑额书法艺术试论. 西华师范大学学报(哲学社会科学版)(06), 130-133.
- [5] 高筱倩(2017). 从碑额篆书看汉代篆书的时代特色. 美术教育研究(20), 25.
- [6] 夏越(2021). 乾嘉时期金石学与书法创作审美之转变. 四川大学.
- [7] 谭延祯&殷占荣. (2020). 探析邓石如篆书风格的形成. 美与时代(中)(08), 77-78.
- [8] 李立山(2019). “印从书出”思想的生成. 中国书法(10), 47-48.
- [9] 贾韬(2019). 徐三庚以金文入书、印研究. 中国书法(22), 113-115.